

文史知识

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

情采缤纷的六朝抒情小赋(上)

中国翻译的历史

怎样查找古代典章制度

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顾问朱家溍答客问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 皇帝大权独揽(秦职官) 孙 钺

朱杰勤

胡国瑞

戈宝权

萧东发 陈慧杰

5

1984

WENSHI ZHISHI



医药学院610 2 01472434

文史知识

1984年第5期

(总第35期)

• 治学之道 • 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		朱杰勤	3
• 文学史百题 • 情采缤纷的六朝抒情小赋 (上)		胡国瑞	10
• 历史百题 • 中国翻译的历史		戈宝权	15
• 怎样读 • 精诚的至情 深沉的同情 ——《长生殿》的主题和艺术		邓乔彬	22
诗 文 欣 赏	沉郁 (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九)	王明居	29
	一曲神奇的交响音画 ——李贺《李凭箜篌引》赏析	杜东枝	33
	水光山色与人亲——李清照《怨王孙》词赏析	傅文青	39
• 文史工具书介绍 • 怎样查找古代典章制度		萧东发 陈慧杰	42
• 文史书目答问 • 中西交通史的名著——《大唐西域记》		洪 偶	47
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顾问朱家溍先生答客问		史 澄整理	50
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比较文明史一例		李学勤	58
• 词学名词解释 (1) • 长短句		施蛰存	63
文化 史 知识	龙首琵琶与凤首箜篌	常任侠	66
	古代的鼓	傅同钦	70
	慈禧的油画像	汪莱茵	74

图书资料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 (连载 6) •

皇帝大权独揽——秦职官之一

孙 钺 78

• 科举史话 (连载 10) •

八股文和试帖诗

王道成 82

{ 人物春秋 }	悲剧英雄项羽	董汉河 徐日辉	88
	匈奴族的杰出领袖冒顿单于	高景新	95
	陈连陞与沙角之战	世博 伯 钧	101

• 青年园地 •

张献忠与耶稣会士

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王 薇 105

• 书画欣赏 • 任伯年的《秋郊射禽图》

水天中 108

{ 成语典故 }	马上得之 诗书治之	胡桂作	110
	沐猴而冠	郑景者	111

• 文史古迹 • 苏禄王和苏禄王墓

刘如仲 112

• 文史信箱 • 古文文体是如何分类的

林兴仁 116

{ 语言 } 词义摭谈:

{ 知识 } “坚壁”与“清野” (94) “一得” (120) 郭庆山

• 文史研究动态 •

《长生殿》主题思想讨论综述

唐 碧 121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关于《“此致敬礼”辟惑》一文的争议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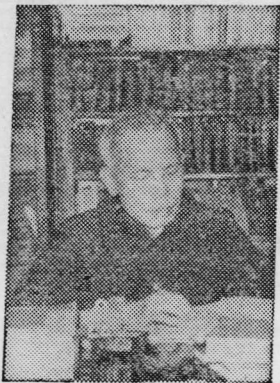
补白 8 则 古代车子构件释名 (9) 禁不住诱惑的度支使 (28)
既能胜任,何必谦让 (38) 孔子劝学 (41) 疑行无成,
疑事无功 (49) 鹿车 (87) 杀风景 (115)

《秋郊射禽图》(封二) 苏禄王墓(封三)

• 治学之道 •

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

朱杰勤



朱杰勤，广东顺德人，生于1913年。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近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亚洲各国史》、《亚洲各国史教学大纲》（古代部分）、《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外关系史译丛》等。

中外关系史过去有人称为中外交通史、中外通交史或中外交涉史等。这可能是在二十世纪初受了日本方面的影响，其实都是很不恰当的。中外交通史使人容易认为只限于交通方面，不够全面。中外交涉史也会使人认为侧重政治外交方面，也有毛病。交涉二字在宋代人的眼中是习惯用语，即关系的意思。宋人有二句诗说：“春虽与病无交涉，雨莫将花便扫除。”交涉即关系。不过我们现代的人多数不懂这个词义，不能用于今天。所以最好用中外关系史这个名词。因为国与国之间有两种关系，即友好关系和敌对关系。这两种关系就概括了和平与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

过去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著名学者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等诸先生也惯用中西交通史这个名词。例如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版）一书，就把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关系的资料搜罗进去，而不局限于欧洲。方豪著的《中西交通史》所涉及的范围是和张氏之书一样。他们这种做法不是

没有道理的。因为从中国出发到西方，由陆地去，就要经过中亚和西亚；由海路去，也要经过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把这些国家纳入中西交通的范围内，是无可厚非的。四十年前，我企图研究中西关系史，有一次我和我的老师朱希祖先生（中国著名史学家，已故）谈到我的设想，与张星烺先生的做法不谋而合。朱希祖先生当面指出：中西关系史一般以西方或欧洲为研究对象，今你研究的对象，除欧洲外还有亚洲和非洲。就应该采用中外关系史这一名词。中西关系史可以作为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寥寥数语，顿开茅塞。现代科学分类，日益精密，中外关系史作为一个学科的专有名词确有较强的概括性和科学性。

在新的历史阶段和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越来越显得重要。1978年，我提出《关于大力发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建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编《情况和建议》第25期），1979年，我在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又提出《关于大力发展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问题》一文，被列为大会材料之五。目的在引起国人对这门科学的重视。今意犹未尽，稍作补充。

一个国家的建立，必有一些国家同时存在，也就必然迟早会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中国也是这样的。研究中国同外国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就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任务。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关系，就必然互相影响，互相往来，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有时也会发生战争和边界问题。总之，不是和平，就是战争，不是交好，就是交恶。这些历史事实的发生，都关系到本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命运。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研究中外关系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的外事工作大有帮助。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史学家，就应该博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这样，才能谈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供后人借鉴。他所谓天下，并不限于华夏或中国，而认为与中国有关的其他国家亦应研究，不仅要博通古今，而且要沟通中外。《史记》的《大宛传》就叙述了汉代时中亚、西亚各国以及伊朗的情况；关于中西交通的还有《乌孙传》及《匈奴传》等。《史记》一书是以中国为主体

的世界史,同时又是中外关系史的雏形。这是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独创。研究中国史的人也应该具备一些中外关系史的知识,例如佛教在古代中国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近人编写的中国通史中也占很多篇幅。谈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不能不涉及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文化交流了。反之,研究外国史的人,也有必要懂些中外关系史的知识,例如研究西方国家怎样由封建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不谈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对东方印度和中国进行侵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等等。这些课题都离不开中外关系史。我们研究外国的人,应该从中国立场出发,如果研究的对象和我国没有任何关系,达不到“洋为中用”的目的,就不一定投入很大的人力去研究它了。我们认为研究中外关系史目的之一,就是要探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我国研究中国史和研究外国史的人共同关心的。

也许有人会问:目前我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的人队伍最为庞大,研究外国史次之,而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寥寥无几,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们认为,数十年来,高等院校历史系都是以中国史和外国史为基础课程,造就人材亦多,对中国来说,研究中国史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史的人自然最多。外国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在十九世纪末期才开始,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王韬的《普法战纪》为代表作。以后虽不断发展,但为时代所限,至今稍为落后。中外关系史作为一门有体系的学科来研究,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人材不多,成果亦少。高校文科也很少能够开出此项课程。因为中外关系史要求高,难度大。学者既需要懂中国史,也需要懂外国史,又需要掌握关系史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能够掌握古汉语,利用古代文献,又要精通一门以上外语,能够运用外文资料。中外关系史又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学者必须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一些史学工作者在对此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信心不强的时候,就往往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了。所以有人称中外关系史为冷门。“风物长宜放眼量”,由于该科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和群众的日益重视,形势迫人。这门科学将由冷门变为热门,亦意中事。

中国在什么时候才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实难稽考。不过，如所周知，自有奴隶社会，就有国家产生和国际关系的建立。我们认为中外关系的发生可以回溯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代已经有许多时服时叛的具有国家雏形的游牧民族如西戎北狄之类。中国最古的史籍如《尚书》，还是称它们为国。国与国之间当然会有贸易往来，也有冲突和战争。例如春秋时代，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以后史书又称他们为匈奴。到秦始皇时代，却退匈奴，迫其西迁。汉武帝又穷追猛打，匈奴就逐步渗入中亚、西亚和欧洲。为什么西人把中国称为“支那”呢？据史地学家考证，“支那”就是“秦”的对音。因为匈奴被迫西迁时，就会把秦的威名到处传播，使西方人认为秦是中国的国号，甚至汉朝取代秦朝的一段时期，西方人还是把汉人称为秦人。支那一名就是这样来的。注释《资治通鉴》的宋代学者胡三省也是这种看法。至于有人考证“支那”是楚的对音，恐怕不对。因为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走入西方，主要通过今天所谓的丝绸之路，而不是楚（春秋时包括今天两湖、江浙和河南一部分）。从西北而来的游牧民族不会舍近图远，不走陆路而走江湖之区。所以多数学者主张“支那”即秦一说。

中外关系史研究，自古以来都认为是一种经世之学，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研究的。汉代匈奴横行，侵犯边塞，掳掠人畜，并阻塞了我国丝绸的对外贸易的道路。汉朝政府不得不对匈奴展开自卫反击战争。司马迁为着适应对外斗争的需要而写出了《大宛传》、《乌孙传》和《匈奴传》。班固《汉书》的《西域传》也是配合汉朝经营西域而作的。唐代佛教昌盛一时，中印交往颇为密切，玄奘法师就奉命撰述《大唐西域记》。宋代与朝鲜友好，使节往来不辍，于是徐兢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之作。由于宋、元、明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来往频繁，经济和文化交流亦盛，于是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明代张燮《东西洋考》都相继出现，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就涌现了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及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等有关中外关系的著作。又在十六世纪后期，中国防倭和援朝抗日期间，有关日本和朝鲜的著作又纷纷出现。清代关于

中俄关系的著作为什么这样多？因为十七世纪俄罗斯不断侵略我黑龙江流域，引起朝野人士的密切注意，于是有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书出版，同时掀起西北史地研究的风气，目的也在对付俄罗斯。十九世纪，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沿海，于是又有魏源《海国图志》的问世。这都是当时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报国表现。

研究中外关系史可以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我们有许多发明创造对世界文化有很大贡献。可惜我们有些科技上的成就被忽视或埋没了。例如印度学者谟克尔吉(Mookerji)写过一部《印度航业史》(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引用了一些谬论说：“在五世纪前，中国人没有到过马来群岛，六世纪前，中国人没有航海到达印度、波斯和阿拉伯。”英国友好人士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说“中国的远洋航行，一直到公元三世纪以后才开始，并且到十三世纪才得充分发展。”(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88页)。这些提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汉书·地理志》有一段史料指出：公元一世纪初，汉武帝统治时期，已有船从广东雷州半岛徐闻、合浦出海，经过东南亚各国，到达印度和锡兰了。(请参看拙著《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一文，见《海交史研究》第三期)。有人根据史料中有“蛮夷贾船转致之”这一句话，认为从中国开往东南亚和南亚的船，不是中国船而是东南亚地区的船。这是一种误会。因为当时北方或中原的人都称南方民族为蛮夷，西汉初雄据两广的南越王赵陀上书汉朝也自称为“蛮夷大长”(即蛮夷最高首领)。可见这些出海的船还是华南方面制造的。公元一世纪前后，中国文化科技水平，远非东南亚各国所及。岂有中国人不会自造船舶，反而依靠东南亚各国船舶之理。据《南州异物志》说：〔海船〕“大者长二十余丈(一丈约今2.4米)，高出水面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每斛十斗)。”这是汉代南方海船的记载。

中国海船到达一个港口后，有时会雇用当地的小船转运商品和搭客上岸，或者从港口转运到其他市镇。“转致”就是转运的意思。这种船舶转运的方式在东南亚各国也是通行的，但不能排除中国船舶远航

到东南亚和南亚的事实。

中西交通以陆路为最早。从中国到西方，可以由玉门关出发，经过中亚和西亚各国到达伊朗，又由伊朗转到罗马帝国。这样漫长的路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究竟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开辟的呢？有人定为公元前106年，我们认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出现了。最近杨建新和卢苇编著的《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根据历史事实，说明张骞通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根据常识判断，路是人走出来的。东方的人不避艰苦，通过草原大漠，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走到西方。西方的人采取相反的方向也可以走到东方。春秋战国时代，不少游牧民族来往于东西两方。游牧民族能走这条路，丝绸商队也会走的，不足为奇。

通往西方的海陆二路开辟后，必然更广泛地导致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在交流中，我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文化成果贡献给全世界。除丝绸之外，还有钢铁和冶铁技术、养蚕技术、陶瓷和制瓷技术，掘井法和制漆法以及农业技术等，都是有益于人民生活的。我国造纸术、印刷术、罗盘针和火药四大发明，对于欧洲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提到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时说：“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马克思对我国三大发明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更加激起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热爱和崇敬。

不仅如此，西方奴隶制度的崩溃，中国方面也间接发生过一些作用。五世纪罗马帝国的覆灭，主要是奴隶起义和市民暴动的结果。但许多欧洲“蛮族”（包括哥特、法兰克、撒克逊等）的入侵，特别是匈奴的入侵，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匈奴，本来被汉朝打败，被迫西迁，他们沿途把中亚一些游牧民族和西方“蛮族”，象波浪一样推入罗马帝国进行破坏，而西方史上赫赫有名的匈奴王阿铁勒（Attila）又带兵攻

入意大利，到处焚劫，更是锐不可当。在内外夹攻下，罗马帝国及其奴隶制度终于垮台了。从上面事实看来，欧洲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又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十八世纪，中国文化传播入欧洲，又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一件大事，其影响是深远的。限于篇幅，不能具述。请参看《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我们看到过去中国人民对世界人类的伟大贡献，而引以自豪。今天我们对四化建设更应充满信心。一方面，从爱国主义出发，尽快地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从国际主义出发，还要进一步为全人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古代车子构件释名

舆(yú)——车箱。王符《潜夫论·相列》：“木材……曲者宜为轮，直者宜为舆。”（宜为：适合做。）

轼(shì)——车箱前面供凭倚扶手的横木。《左传·曹刿论战》：“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

辋(wǎng)——车轮的边框。《拾遗记·魏》：“车皆镂金为轮辋，丹画其轂轳。”

轂(gǔ)——轮子中心有孔的圆木，孔用以插车轴。《老子》：“三十辐共一轂。”（辐：见下。）

辐(fú)——相接于轂和辋之间、按辐射状均匀排列的木条。（例上）

辖(xiá)——安在车轴两末端的挡铁（销子），用以管住车轮，不使外脱。《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门豹为邺令，佯亡其车辖。”（佯亡：假装丢掉。）

辕(yuán)——车前驾牲口用的直木（车杠）。《墨子·杂守》：“板箱长与辕等。”（等：相等。）

轭(è)——辕前端套在牲口脖子上的曲木，形状略作“人”字形。梅尧臣《观杨之美画》诗：“双骖推轭如畏迟。”

轳(lú)——垫在车轮底下的木头，用以阻止车轮转动，行车时需先将轳移开，所以启程也叫“发轳”。屈原《离骚》：“朝发轳于苍梧兮。”

（朱文献）

情采缤纷的六朝抒情小赋

(上)

胡国瑞



谈到六朝(魏晋宋齐梁陈)文学,有人可能会错误地意识到,那时在形式主义氛围笼罩下,文坛上满是丛杂的恶草。其实,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这片境地幽异的文学领域里,还是到处亭立着品种新奇、鲜美的花丛的,抒情小赋即是其中烂然溢目的一种。

赋曾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在汉代蔚为文学的主流,赋坛成为当时许多巨匠显示身手的场地,写出大量侈陈宫馆田猎的宏篇巨制,腾发出时代的强音。在汉代大赋象江河波涛汹涌的同时,它们的作者笔下间或也出现过抒情的小赋,似深山峡谷的清流,颇能令读者心神爽然的。如贾谊的《弔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弔二世赋》,下至张衡的《归田赋》,以及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是常在人们口头传颂的名篇。这类抒发人生感慨的小赋,其作用同于抒情诗,追溯始源,从内容到形式,应肇端于屈原的《九章》,及相传为宋玉作的《九辩》。由此可见,抒情小赋的由来,为时相当久远。

到了建安时期,由于时代动乱,文人感慨炽盛,且文酒之会频繁,为了抒写激情,诗篇之外,也杂用辞赋。既属抒情,且多为当筵命笔,故篇幅自然短小,加以文人的思想解放,情思活泼,以及文学本身在新的发展中对于美的自觉的追求,于是经历两汉以来涓涓细流的抒情小赋,骤如出峡的平川,流面顿形宽广,一直贯注着整个六朝的文学区域,到处形成娱人的艺术胜境。由于作家的时代及生活处境的殊异,他们在赋中抒写的感情性质涉及的方面亦各殊致,因而各自呈现的艺术风貌,也意趣纷然,独具芳妍,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特定时代独有的艺术珍品。

通观六朝抒情小赋的名作,就其艺术特点极概略地说来,就是篇幅短小,叙写简要,而情韵流溢,有

紧系读者心情的艺术魅力。但它们所呈现的风貌，随着时代的进展，社会生活及文学风气诸因素的变化，亦各自具有阶段性的特点。下面我想分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扼要地谈谈抒情小赋的历史发展。

一、魏晋抒情小赋的新面貌

魏晋时代，这类作品的抒情比较直接明朗，有的整体呈现得特别精悍，试看王粲的《登楼赋》。（文繁不录，请参见本刊1983年第二期《“魏晋之赋首”——读王粲〈登楼赋〉》一文。）

这篇赋当作于建安九、十年间（204—205）。作者因李傕、郭汜之乱离开长安而南奔投依刘表，但在长期流落中未得到地方主人的重视，遂偶因登楼眺望而触动感慨，乃写下这篇名作。整篇赋的内容可分三层：“曾何足以少留”以上为第一层，写登楼所览；“岂穷达而异心”以上为第二层，抒怀乡之情；“惟日月之逾迈兮”以下为第三层，抒写由登览、怀乡而激发的强烈矛盾心情。在每层中，各以极紧密的章法，精要的文辞，集中地把其中心思想表达得充分完足。即以第一层言，首二句叙明登楼及目的，三、四两句总述对楼所处地势的观感，以下则于楼的左右前后远近四方各以一语扼要叙出，而“华实蔽野，黍稷盈畴”二句，以高度概括性的健笔，把沮漳两岸郊野夏秋之际的丰稔景象，勾画得无限悦人心目。这段内容，如果在汉代大赋家手头，尽可从多方面恣意铺陈，挥洒千言。而本赋作者只撮要提点，使辞意俱极精粹，其产生的艺术效果，远非宏篇巨制所能比。

赋的通篇都贯穿着登览这一主题，而随着眺览之际情绪的发展转变，每层景物的色调亦顿觉殊异。上层所写为刚一登楼眺望的感受，觉得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辽阔畅适的景象。同是一个辽阔境域，在中层里乡土之思激起后，感到的却是山阻、路遥、水深了。下层表达的则是因遭乱长期流离异域而导致的身世之忧，于是这时原野在他眼前呈现的，则是景象萧索，鸟兽遑遑，战乱未已，感到人生前途一片凄黯。作者的情绪，在楼上眺望中逐步发展，终至气愤胸臆，夜半犹反侧不能成眠，把内心的矛盾展示得无比充分。作者开始表明登楼是为了销忧，而结果适得其反，可见作者平时所怀忧愁之深重，是无法消除的。我们从赋中可看到作者的活动：由登览而怅望、而深思、而徘徊。

徊，终于心情激荡地下楼，以至归去不寐；其时间则由白昼而晚暮而至夜半，一切历历展现在读者眼前。赋中虽曾使用孔子、钟仪、庄舄的故事，意在言怀土之情，无论圣贤穷达皆所不免，及以匏瓜、渌井表明自己用世之志，皆适当其分，无损于感情的充沛流溢。

作为建安文坛主将的曹植，其集中现存的小赋还不少，看来都是率意命笔，有一定的情致，总不够精采，只有《洛神赋》一篇，为其才情粲溢之作。它在小赋中是篇幅较长的，但也不过九百余字。其体段写法约略相当于宋玉的《神女赋》，而其形象结构则胜于前作。作者在赋中通过对于洛神的描写，寄托其对美好理想愿望的追求，故其笔下展现的洛神，神采艳逸，情调高远，绝去了宋玉、司马相如描绘美人的俗态。如其初露面时的形容：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作者以自然界中各类鲜美生动的物象，比喻地形容洛神活动时的神采，写得如此飘忽闪烁，光丽炫目，远近明暗，令人不遑审视。接着就她的体貌衣饰作了必要的描叙，而写到她的行止情状，紧扣着她作为水神的身份，构成一幅完整丰富的形象。赋的末端，写到洛神与人的接触：

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

她是这样一往情深，缠绵悱恻。在邂逅的良好会晤中，终因“人神道殊”，于郑重地表明心迹后悠然倏逝，使人感到无限怅惘，莫可追寻，成为不可弥补的阙失，而又颇耐人体味寻思。

魏末时期值得称道的是向秀的《思旧赋》。这篇赋是为悼念好友嵇康之死而作。赋的前面有一段小序，开始叙说他与嵇康及另一友人吕

安的朋友关系以及二人的才性及结果，接着单独提出嵇康说：

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这里先叙说嵇康的绝妙才艺及其高旷风度，这样的朋友自然要令人怀念。接着叙写他经过嵇康旧居时引起他怀念故友的情景，简要的几行文字中，饱含着对故友的悼念深情。

赋文通篇只一百五十六个字，内容很简单，前半叙说经过嵇康旧居的经历景况，后半抒发对嵇康的伤悼之情。在写到他看见嵇康旧居一片荒凉空虚时，慨叹说：“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黍离”、“麦秀”本是古人抒发故国破亡之痛的歌咏，为什么用于伤悼旧友呢？因为向秀和嵇康、吕安在政治态度上是一致的，这时魏政权已全部落到司马氏手里，魏已名存实亡，作者这时在伤悼故友的丧亡时，俨如看到故国的残毁，很自然地把两种感情融合得如此无间，暗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之意^①，从对个人的伤悼中，隐含着深刻的政治感情的。赋的下半写道：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这里用李斯临死时的话，与嵇康毕命前的表现相对照，以显示嵇康的高远情调，愈见其死去之可惜。李斯以其多年为秦丞相之尊，临刑时回头对其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表现的情态多么可鄙。而嵇康当死前只有极短暂的时刻，还从容不迫地演奏一次自己的音乐绝技，这种精神境界何等不凡！以这样一位风调超逸的人士，竟不免于杀身之祸，作者唏嘘的凭吊，便是对于残酷的屠杀者的强烈的控诉。这篇伤悼旧友的小赋，抒情既极凄恻深永，寓意亦甚曲折深刻。而因闻笛感念死友，遂成其后文人常用的典故，如刘禹锡的诗句云：“怀旧空吟闻笛赋”^②，便是怀念志同道合的死友

① 《诗经·大雅·瞻卬》。

②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吕温的。

在曹植、向秀以前还有祢衡的《鹦鹉赋》。作者以鹦鹉具有特异的色彩性能被人所网罗，影射地陈诉文士以才华而遭牢笼的心情，写得即物即人，曾被古人评为“辞采甚丽”之作。

西晋时期，作为文坛代表的陆机、潘岳，赋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他们也写了些抒情小赋，如陆机的《叹逝赋》及潘岳的《怀旧赋》，同是伤悼故旧的逝去，并是一般人的常情，陆机因之提高到自然规律来看待，辞意比较深沉。而潘岳另有一篇《秋兴赋》，其艺术表现有值得注意之处。潘岳在其《秋兴赋》的序言中表明，他因在宫廷中值班有所感慨，时值秋天，“故以‘秋兴’命篇”。他在赋中表示，因时节的变更而觉悟到人事的危机，思“投绂以高厉”。这不过是偶然的思想活动，从他的平素为人看来，这话并不真诚。但他在赋中对于秋天景物的描写，颇能给读者以时节风物之感。如云：

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野有归燕，隰有翔隼，游氛朝兴，槁叶夕殒。……庭树殒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蝉嘒嘒而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朧朧以含光兮，露凄凄以凝冷，熠燿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道尽兮，慨俯首而自省。

作者从时节的气候的变化，草木的凋零，虫鸟的飞鸣等多方面渲染出一片浓厚的秋意，使人精神上感觉既萧索而又清疏，从中可以启发出许多有关人生的深思。这种时节风物之感的抒写，还是从《楚辞》启发出来的，赋中曾举出宋玉《九辩》的发端之辞作为引语，而这类描写这时回到赋中来，与当时诗人作品中大量出现自然景物的文艺步调是一致的，如张协的《杂诗》，最足以显示出这种趋向。

东晋时期，赋和诗同样消沉，就是孙绰自夸“掷地要作金石声”的从《游天台山赋》，写景非常浮泛，读者不会从中得到游览名山胜景的妙趣。这里就姑且从略了。（未完待续）

戈宝权

中国翻译的历史



在我国，翻译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远从公元前的西周和先秦时代起，就设有称为“象寄”和“象胥”的通译官。汉、唐以来是我国翻译佛经盛极一时的朝代，及至宋代也未稍减。元代专门设有从事翻译的官。到了明代，随着耶稣会士的入华和天主教的传入，开始了“西学东渐”的时代，不少西方自然科学的著作最初被译成中文。清代随着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和基督教的传入，开始建立起同文馆和译学局。到了晚清民初，才有人从事翻译西洋的社会科学和文学名著。“五四”运动以后，翻译工作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上各个时代的翻译，对我国的文化、文学和艺术都曾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这一段长达两千多年以上的翻译的历史，值得我们简略地来加以回顾。

从“象寄”、“象胥”到“翻译”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曾提到“象寄之才”这个名词。何谓“象寄之才”呢？查我国古代的典籍，在《周礼·秋官司寇》中称“掌蛮狄诸国传谕言辞”、“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礼记·王制》中称“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汉代大学者郑康成曾对此作了解释：“东方曰寄，南方曰象，……周始有越重译而来献，是因名通言语之官为象胥”。从此看来，“象寄”和“象胥”就是我国古代的翻译人员。

北方既然曰“译”，随着汉代与北方匈奴各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作为通译人员的“译”，就代替了西周和先秦时代的“象寄”和“象胥”。到

了东汉我国开始译述佛经，又在“译”字的前面加上了一个“翻”字，遂成为“翻译”，从那时起“翻译”这个名词就一直沿用至今。宋代高僧赞宁在《译经篇》中曾写道：“译”者“不过察异俗，达远情”，而“翻”则“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就道明了翻译与原作的差异之处。

今人钱钟书曾根据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翻译”所作的训诂：“囙，译也。从‘口’，‘化’声。……读若‘譌’”，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譌’、‘讹’、‘化’和‘囙’，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相连，彼此呼应的意义，……把翻译能起的作用，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他在这里也征引了赞宁的话说：“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由于古代的“象寄”、“象胥”和“译”的翻译人员，主要是通译，也就是口译，因此遗留下来的翻译文献就非常之少了。

汉、唐以来的佛经翻译

随着佛教的东传，我国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才最初有了关于翻译佛经的记载。相传当时有博士弟子从大月氏王的使者口头翻译了《浮图经》。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中天竺（今印度）僧人迦叶摩腾（一名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河南洛阳，住白马寺，合译了《四十二章经》。摩腾圆寂后，竺法兰又译了《佛本生经》、《佛本行经》等，成为我国翻译佛经的开始，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名清）又来到洛阳，在二十多年中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佛经九十五部，共一百一十五卷，对后世的禅学有一定影响。

在苻秦时代，我国出现了第一位佛经的大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他原籍天竺，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龟兹（今新疆库车）王的妹妹，他本人出生在龟兹，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遣使迎至长安，尊他为国师。他在长安的逍遥园建立译场，与弟子八百余人翻译了《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等佛经七十四部，共三百